

政治话语的西方霸权:生成与解构

陈曙光

内容提要:西方开辟了世界历史,西方政治话语伴随着它的主人走向了世界,基本主宰了人类的政治议程和政治活动,国际政治舞台迎来了西方政治话语的霸权时代。资本与权力的合谋,是西方政治话语走向霸权的关键密码。“拿实力说话”是通行的国际政治规则。在国际政治舞台,“谁在说”比“说什么”更重要,话语的主人比话语的真伪更关键。西方话语霸权是历史的产物,有其内在的形成机理:西方的发展优势借助学术包装,转化为话语优势;西方的话语优势借助越界本能,转化为话语空间优势;西方话语的空间优势借助资本逻辑和国家力量,转化为道路和制度的同质化过程。西方话语霸权,其终极目的在于塑造一元话语世界和现实世界。哪里有霸权,哪里就有反抗。终结西方话语霸权,理所当然成为当今世界反对霸权主义的一部分。但霸权从来不会自我终结,终结话语霸权的力量只能从外部成长起来。展望 21 世纪,走向美美与共的国际话语时代,希望在东方,东方的希望在中国。

关键词:话语体系 国际话语权 西方政治话语 霸权

西方开辟了世界历史,西方政治话语伴随着它的主人走向了世界,主宰了人类的政治议程和政治活动,国际政治舞台第一次迎来了西方政治话语的霸权时代。所谓政治话语的西方霸权,意指西方依仗话语的优势地位,垄断了政治议题的设置权和政治议程的主导权,垄断了自由、民主、人权等政治范畴的定义权,垄断了不同社会制度、政党模式和政治体制是非优劣的评判权,垄断了国际政治格局的塑造权、国际政治规则的制定权以及国际政治争议的裁量权。

一、西方政治话语何以走向霸权:资本与权力的合谋

政治话语霸权是一种历史现象,政治话语霸权的奥秘主要不在话语本身,而在资本与权力(国力)的合谋。强大资本与强大国力的联合,足以支撑起强大的话语权威。强大话语往往背靠强大国家,强大国家才是“时局的真正主人”。“政治权力只不过是经济权力的产物”,^①政治话语权、政治话语霸权都源于经济权力,决定于强大国力,离开经济条件和物质基础,离开建基于金融、军事、科技、文明之上的强大国力,不可能形成政治领域的意识形态霸权。古往今来,居于世界舞台中心国家的话语在每一时代都是世界上占主导地位的话语,综合国力强大的国家在每一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2 卷,第 80 页,人民出版社,1998 年版。

时代都是占据世界舞台中心的国家。没有强大资本的推动,不会形成话语霸权,因为没有令人冲动的东西;没有强大国力的支撑,不会形成话语霸权,因为没有令人畏惧的东西;没有成熟的政治话语,也不会产生话语霸权,因为没有令人尊敬的东西。资本、权力(国力)和话语,三者皆备,才有可能建立话语霸权,掌握塑造世界政治格局的能力。在国际舞台上,西方凭借资本权力横行世界,西方的地域性话语也跃升为世界性话语。西方既是国际资本的占有者,也是国际权力的掌控者,资本和权力的双重护卫,奠定了西方政治话语的霸权地位。

实力原则是国际话语场的首要原则。在国际舞台上,“占主导地位的话语权不过是占统治地位的经济关系在国际话语场的表现,不过是以话语形式表现出来的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经济硬实力的起伏变化必将或快或慢地导致国际话语权力的同向变化。”^①这是国际话语权的生成逻辑和演化规律。这一规律与马克思恩格斯揭示的意识形态运动规律具有高度一致性,他们认为,“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不过是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在观念上的表现”。^②意识形态统治规律既适用于一国之内,也适用于国际社会。在国际舞台上,谁掌握了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谁才能掌握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力量和话语权。今天,西方的物质力量占据压倒优势,西方的话语优势顺理成章,国家硬实力从来都是话语权力的最大支撑和主要来源。在这里,实力原则往往凌驾于真理原则和道义原则之上,三者正相匹配是理想,二律背反是常态。

国际话语权的争夺,其核心在于“谁在说”,而不是“说什么”。几个世纪以来,欧美国家掌握着最大的国际话语权,但这绝不意味着他们掌握着最多真理权。他们凭借强大国力,编织了一系列标识性概念和话语,比如,针对广大发展中国家有:“普世价值论”“西方中心论”“文明冲突论”“文明优越论”等;针对社会主义国家有:“历史终结论”“别无选择论”“民主社会主义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失败论”等;针对伊朗、伊拉克、利比亚、朝鲜等国有:“邪恶帝国论”“无赖国家论”“邪恶轴心论”“失败国家论”等;专门针对中国的标识性话语更是汗牛充栋:“中国威胁论”“中国崩溃论”“新帝国主义论”“修正主义国家论”“新殖民主义论”“C型包围圈”“锐实力”“打桩者”等。然而,这些政治话语究竟有多少真理性呢?这里无庸赘述。在当今国际舞台上,解释世界的话语主体和改造世界的行动主体是高度统一的,总体上掌控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手中。一方控制世界,另一方解释世界,这样的“分工合作”关系在国际话语场是完全不存在的。

国际经济格局、国际政治格局与国际话语格局具有高度的一致性。“国际话语格局本质上是国际政治经济格局在话语场的一种反映和折射,是以学术话语的形式呈现出来的国际格局。”^③一般来说,“国际话语变迁”“国际政治权力变迁”“国际经济中心变迁”总是亦步亦趋,具有高度的吻合性。比如,从18世纪到20世纪初,英国是国际经济中心和国际政治中心,世界秩序由英国塑造,国际话语舞台由英国把持,美国不过是英国主导下的国际体系中的一员。然而,20世纪上半叶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随着美国崛起和美国霸权地位的最终确立,日不落帝国主导的国际体系随之瓦解,国际政治权力和经济中心从欧洲转向美洲,欧洲中心主义代之以西方中心主义,国际政治话语第一次迎来了“美语”时代。进入20世纪中叶,随着苏联的崛起以及社会主义阵容的形成,世界格局两极对垒直接导致了政治话语的两极对峙。1991年,苏联解体,雅尔塔体系瓦解,世界体系回到美国主导的时代,西方政治话语再次获得了压倒性优势,西方话语的霸权地位进一步巩固。

①③ 陈曙光等:《论话语权的演化规律》,《求索》,2016年第3期。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78页,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

二、话语霸权的生成机理:“三步走”策略

西方政治话语是人类政治文明史上的一朵奇葩,它的出现有其历史合理性、实践合理性、价值合理性,但这绝不能构成霸权的理由。西方政治话语霸权不是从来就有的,它是历史发展的产物,是国家间利益博弈、话语较量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西方政治话语走向霸权可分解为三步。

第一步,西方的发展优势借助学术包装,转化为政治话语优势。第一次工业革命以来,西欧率先开辟了现代化道路,率先完成了现代化任务,率先享受了现代化成果,率先建构了现代性文明。事实最有说服力,西欧国家依托发展优势,从西方的利益和立场出发,攫取了压倒性的话语权,在全球知识界掌握了强大的统治力和解释权。

西方政治话语的逻辑推定是这样的:西欧的卓越地位,关键在于西方的政治制度相对于其他制度具有鲜明的比较优势,西方的政治道路是通往现代文明的必经之路,西方的政党体制是捍卫现代文明的可靠保证,西方因此成为世界经济的中心、国际政治的中心和现代文明的中心。其实,他们也许不懂得,没有超越于民族经验之外的历史解释。没人能确信自己的解释绝对正确,人人都要听听别人怎么讲。所有的历史都是暂定的,谁也不能自认是定论。^①西方的“话语霸权是通过自命为‘科学’而获得的。似乎西方人掌握着科学地理解和解释历史的方法,而其他民族仍然是神话地、宗教地、情绪地理解自己和他人的历史经验。”^②在西方中心史观看来,广大发展中国家除了复制西方的自由民主制度,没有别的路可走;重走西方文明之路,最终变成西方,是历史留给后发国家的任务。西方话语相对于异质话语的优势地位由此得以确立。

第二步,西方的话语优势借助越界本能,转化为话语空间优势。西方的政治话语产生于独特的西方背景,有明确的领地和空间范围,但安分守己不是西方的行为准则,西方话语从来不会偏安一隅,越界和扩张是西方话语的本能。

西方政治话语扩张以挤压弱势话语的生存空间为代价,西方政治话语越界的过程同时也是非西方政治话语式微的过程。西方政治话语具有排他的基因,意图通过消解弱势话语的合法性,挤压异质话语的生存空间来扩张自身的地盘,谋求自身价值的最大化。鼓吹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的英国作家拉迪亚德·吉卜林(Rudyard Kipling)在一首短诗中这样描写,欧洲“理应承担起白人的责任,将你们培育的最好的东西传播开来”。伴随着西方政治话语的强势扩张,西方地域性的政治文明和价值观走出欧洲的领地,走向美洲、亚洲、非洲,走向全世界,上升为全球意识形态,获得了统治性的话语地位和压倒性的话语权威,同时也获得了超越民族疆域的话语空间。在西方制度文明的强大冲击下,很多非西方国家失去了制度选择的自主性,沦为西方政治文明的学徒。在我国,尽管中华文明由于自身强大的发展惯性和遗传基因绵延至今,尽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道路获得了巨大成功,但迷信西方政治话语者依然大有人在,港独、占中、修例风波就是例证。

第三步,西方政治话语的空间优势借助资本逻辑和国家力量,转化为政治道路和政治制度的同质化过程。西方政治话语绝不会满足于话语空间上的扩张,道路、制度和价值观的同质化才是西方念兹在兹的追求。当一个国家占主导地位的政治话语被成功“西化”之后,政治制度、发展

① 参见乔伊斯·阿普尔比(Joyce Appleby):《历史的真相》,“绪论”,第11页,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年版。

② 韩震:《历史解释与话语霸权的消解》,《哲学动态》,2002年第5期。

模式和意识形态的西方化是很难避免的。反过来,社会制度、发展模式和意识形态的西方化又会进一步夯实西方政治话语的底座,巩固西方政治话语的霸权地位。

西方政治话语霸权,通俗的说法是:“不管你是谁,你到了我这儿,一切都会变成我的;我到了你那儿,一切依然还是我的”;严谨地说,就是“以西方政治文化所表达的价值取向来匡定发展中国家政治发展的目标和取向”。^① 爱德华·W·萨义德(Edward W. Said)说,“国家本身就是叙事。叙事,或者阻止他人叙事的形成”。^② 在和平与发展成为世界主题的国际背景下,西方大国军事侵略、土地殖民的国际空间被极大地挤压了,但帝国主义主宰世界的初衷没有改变,建构同质化世界的图谋没有改变,只是他们采取了民主输出、制度输出、文化殖民乃至颜色革命这些新的形式。

世界同质化过程有两个经典公式:全球化=西方化,现代化=西方化。全球化是世界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现代化是人类社会的共同追求,都是人类社会无法绕开的发展方向。但西方主导的全球化就是全球趋同化,西方牵引的现代化就是世界西方化,最终目的是以西方发展模式、政治制度和价值观重塑整个世界。美国左翼学者詹姆斯·彼得拉斯(James Petras)在《二十世纪末的文化帝国主义》一书的开篇即指出:“美国文化帝国主义有两个主要目标,一个是经济的,一个是政治的。经济上要为其文化商品攫取市场,政治上则是要通过改造大众意识来建立霸权”。^③ 萨义德的观点与彼得拉斯具有高度的一致性,在他看来,军事的统治、“土地的侵略”绝非“帝国主义”一词的全部内涵,“帝国主义”在21世纪主要表现为“统治遥远土地的宗主中心的实践、理论和态度”,^④ 包括“文化的改造”“社会的重建”“标准的统一”,也就是按照自己的面貌创造出一个新世界,按照统一的政治标准改造非西方国家,以期推动世界的同质化过程。

三、话语霸权的终极目的:塑造一元话语世界和现实世界

西方政治话语霸权,其目的在于塑造一元化世界。所谓一元化世界,既包括一元话语世界,也包括一元现实世界。就话语世界来说,西方试图通过确立西方政治话语的唯一合法地位,垄断对全球性政治议题的主导权、全球重大政治问题的解释权;就现实世界来说,西方试图通过放大其政治学说改造世界的功能,谋求对世界秩序的建构权、世界历史的塑造权。长期以来,西方因为先发优势走在世界的前列,养成了目空一切、唯我独尊的制度优越感,养成了西方中心主义的思维方式,对非西方政治制度采取鄙夷、轻蔑的态度。今天,全球政治话语几乎完全由西方主导,“发达国家既是世界话语的主产地,又是传播渠道的主控者,内容与手段双重操控下所形成的话语霸权塑造了媒介世界的现实图景”。^⑤ 西方政治话语的全球扩张,已经成为全球性风险的文化根源,成为全球发展赤字、治理赤字、信任赤字、和平赤字的重要根源。西方凭借强大的话语权力,肆意抹黑他国的政治体制和政党制度,随心所欲篡改他国的历史和文化,甚至不惜手段主导他国的政治议程,大肆推行西方政党制度和政治模式,试图打造一个由西方民主制度塑造的“一元化世界”。环顾世界,西方策动的制度输出、价值观输出乃至“颜色革命”,并未带给世界民主自由、和平安宁,而“同质化理想”更是无助于建设美好世界。

① 王沪宁:《政治的逻辑》,第440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

②④ 爱德华·W·萨义德:《文化与帝国主义》,第3页,第9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版。

③ James Petras, "Culture Imperialism in Late 20th Century", *Economic and Political Weekly*, Vol. 29, No. 32, 1994.

⑤ 孟威:《构建全球视野下中国话语体系》,《光明日报》,2014年9月24日。

20 世纪中叶,世界历史正式进入美国时代。全球“美国化”,以美国的制度模式和民主价值观重塑整个世界,一直是美国政府全球战略的核心诉求和文化使命。亨利·基辛格(Henry A. Kissinger)指出,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接过世界领袖的火炬,传播西方民主因此成为国际秩序的首要目标。^① 20 世纪 80 年代末 90 年代初,苏东剧变使得西方人,特别是美国人相信,“全世界正在进行着一场民主革命,用不了多长时间,西方的人权观念和政治民主将在全球盛行,因此,促进民主的传播成为了西方人首要的目标”。^② 1990 年 4 月,时任美国总统乔治·布什(George H. W. Bush)指出,“我们的新任务是促进和巩固民主制度”。^③ 时任美国国务卿詹姆斯·贝克(James Baker)说,“在遏制之后等待着的是民主制”。^④ 1992 年,比尔·克林顿(Bill Clinton)在大选中反复强调,“推进民主是该政府的首要考虑”。^⑤ 克林顿政府国防部长确认,“促进民主是国防部四个主要目标之一”。^⑥ 在西方看来,西式自由民主制度是最好的制度,理应统治世界,全球政治格局理应由西方来塑造,全球政治话语理应由西方来掌控,理想目标是建构以西方政治话语为主体的单一话语世界,以西式自由民主为模板的一元现实世界,以西方制度模式为蓝本的合格世界公民。在西方中心论思维的支配下,西方媒体关于中国政治体制、政党制度、人权状况、民族问题、宗教事务等方面的报道,从角度选择、新闻素材取舍到叙事结构、观点安排无不充斥着西方标准、立场和逻辑,世界的“中国记忆”被打上了浓厚的“西方烙印”,西方政治话语的概念体系和学术框架成为世界理解中国的唯一中介、必经通道,因而也构成了还原中国图像的巨大障碍。

然而,参照西方制度模板塑造的现实世界真的是各国的理想归宿吗? 全球 200 多个国家共享一种民主模式真的是唯一的出路吗? 西方政治制度真的是人类赖以安身立命、诗意栖居的场所吗? 世界各国除了仿建另一个“西方”真的别无选择吗? 其实不是。世界上不存在某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政治模板,西方政治模式只是现代政治谱系中的一种模式,而不是唯一模式。“全球单一文化论者想把世界变成像美国一样”,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P. Huntington)对此也持批评态度,在他看来,“多元文化的世界是不可避免的”,普世主义“对西方和世界都构成了威胁”^⑦。我们不能用一种制度模式否定其他的制度选择,不能用一套政治话语否定其他国家重写现代政治的权力,正如不能用一朵奇葩代替五彩缤纷的世界一样。新加坡政府 1991 年发表的白皮书列举了本国的共同价值观,其间只字不提西方定义的以议会民主为标志的政治价值观。白皮书强调,新加坡“在关键方面是一个亚洲社会”,“如果在更长的时间里新加坡人变得与美国人、英国人和澳大利亚人难以区别,或者更坏,成为他们可怜的仿制品,那我们就丧失了与西方的区别,而正是这些区别使我们能够在国际上保持自我”。^⑧ “保持自我”,这不过是对任何一个主权国家的底线要求,但在西方政治模式主导全球政治议程的情况下,能够保持自我的国家却为数不多。

一元话语世界和现实世界不是人类的理性选择和理想归宿,它本质上是反理性的、不理想的。自由、民主确实是现代性的核心内涵,但现代性从来不是一元的,西式现代性只是现代性的一个版本,西方政治模式只是现代民主政治的一种方案。世界上没有两片一样的叶子,我们为什么要削足适履,将同一个模板强加给不同的国家? 每个民族、每个国家都有权选择适合自己的现代政治制度,书写属于自己的制度现代性。在建构现代政治文明方面,西方取得了巨大成功,但也逐渐暴露出西方制度的先天缺陷。这突出地表现为:神化选票的同时,走向了民粹主义的深

① 参见亨利·基辛格:《世界秩序》,第 474 页,中信出版集团,2015 年版。

②③④⑤⑥⑦ 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第 211 页,第 368 页,新华出版社,2002 年版。

⑧ Government of Singapore, [White Paper on] *Shared Values*, Singapore: Singapore Parliament, Cmd. No. 1 of 1991, p. 10.

渊;强调权力制衡的同时,走向了否决政体、极化政治;尊重人权的口号下,掩盖着枪支泛滥、种族歧视、性别歧视、践踏生命(疫情期间看得更加清楚)的人权真相;多党竞争的外衣下,掩盖着党争纷沓、政党倾轧、相互掣肘的事实;政治选举着眼当下,无视国家的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西式民主的背后,实质是资本操控和金钱政治;程序正义高于一切,却往往以实质非正义为代价。

中国政治道路的成功,证明一元话语世界是不合理性的,一元现实世界也是不可行的。中国绕开了西方的政党制度和政治模式,开辟了具有鲜明中国特色、显著制度优势、强大自我完善能力的现代政治文明之路。这是一条与西方政治道路完全不同的,以党领导、多党合作、人民主权、依法治国为特色的新型政治道路。中国赋予了自由民主以中国内涵,赋予政治制度以中国特色,终结了西方制度文明的一元化统治和同质化前景,开启了两条政治道路比拼发展的多样化时代,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政治选择和制度方案。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世界历史意义。

四、话语霸权的终结:一种实在的可能性

“哪里有权力,哪里就有反抗”。^① 终结西方政治话语霸权,还原多元话语世界,理所当然地成为了当今世界反对霸权主义的一部分。

终结话语霸权非一朝一夕之功,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迄今为止,西方雄踞的话语舞台还未出现宾朋满座的场面,“英语”仍是主要的语言,西方的声音仍然是主流的声音,西方的政治制度和政党模式仍然是主流的选择,政治制度的欧美方案仍将占据主导地位。终结西方政治话语霸权,目的地仍然在远方。但我们也要认识到,终结西方政治话语的霸权地位,绝不是抽象的臆想,“本身是实在的可能”。^②

第一,西方政治话语根植于西方样本,只有“西方”才能准确地标识自我的身份和边界,一旦越出西方的地理边界,也会陷入“我是谁”的身份迷茫之中。西方政治话语的合法性源于西方的成功实践,绝不具有无条件的真理权。任何政治话语,都可能存在两面性:普遍性的一面和特殊性的一面,都是这两面的浑然一体,这是在话语问题上的辩证法。一种话语,之所以膨胀到唯我独尊的境界,大概是不懂得这个辩证法,将特殊性上升为普世性,将民族性等同于世界性,将地域性放大为全球性。正如亨廷顿所说,“西方文明的价值不在于它是普遍的,而在于它是独特的”。^③ 西方政治话语也服从同样的逻辑。今天,按照西方的政治逻辑塑造世界,这是西方力量所不及的。在世界迎来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背景下,捍卫西方政治文明的独特价值,放弃普世主义的乌托邦理想,方才具有现实的意义。西方政治话语霸权的终结,不过是从唯我独尊的身份退出,回归到本来的位置,与其他话语和平共处、平等对话。退出霸权地位的西方政治话语,丝毫不影响在它的出生地,在自身适用的空间领域和时代范围内,依旧具有最大的合法性。

第二,西方中心论只是一个在“正确的历史时期”产生的错误的历史逻辑。所谓“正确的历史时期”,指的是近代以来,世界历史主要表现为西方历史,现代化是西方开启的,全球化是西方推动的,世界秩序是西方塑造的,全球民主化进程是西方主导的,乃至人类命运都是西方掌控的,“西方”俨然成为真、善、美的代名词。这是一个西方主宰全球的时代,是世界多数国家向西方制

① Michel Foucault, *The History of Sexuality*, Vol. 1: An Introduction, Trans. Robert Hurley, New York: Vintage Book, 1990.

② 黑格尔(G. W. F. Hegel):《逻辑学》(下卷),第200页,商务印书馆,1976年版。

③ 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第360页。

度靠拢的时代,是欧美政治逻辑塑造世界历史的时代,也是西方中心主义狂飙的时代。所谓“错误的历史逻辑”,指的是西方政治话语本质上只是西方政治实践和制度建设经验的理论提升,而非世界历史经验的普遍反映;西方的政治理论、政党学说本质上只是地域性的知识而非普遍性的知识,只具有地域性的价值而非普世性的价值;因而,所谓欧洲的就是世界的,所谓人类和地球的欧洲化就是世界的未来,所谓现代民主政治就是三权分立、多党制衡、议会民主、轮流坐庄,这套先验逻辑是错误的。西方政治话语对于西方也许具有极大的真理性,但对于广大的非西方国家而言,其真理性则是一个有待验证的问题。

在话语领域,中心-边缘的线性思维是不可取的。不存在某种话语无论何时何地都可以固守中心舞台,也不存在某种话语无论何时何地都只能担当陪衬的角色。也就是说,任何居于中心的强势话语也会存在边缘地带,任何居于边缘的弱势话语也会有自己的中心舞台。一套政治话语主导全球的政治制度设计,理论上是行不通的,实践上是有害的。一种政治制度、政党模式是否具有合理性,这不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一个实践问题,只能由这个国家的实践来回答,没有理由在西方话语的霸权宰制下被人为地扼杀,在沉默中走向消亡。

第三,国际力量对比深刻变化极大动摇了西方话语霸权的物质基础。如果说国际力量对比中,西方力量的绝对优势,造就了西方政治话语的霸权地位;那么,西方力量的相对衰落也必将深刻影响西方政治话语的霸权地位。20世纪末21世纪初,东西方实力对比的天平发生变化,随着中国、印度、俄罗斯等新兴市场国家的群体性崛起,西方时代开始褪色。世界政治格局呈现多极化趋势,世界经济呈现西欧、北美、东亚多中心趋势,世界话语格局也展现出多样化的发展态势。今天,东西方的发展差距前所未有拉近,新兴市场国家追赶的脚步越来越紧,西方政治话语的霸权地位呈现松动迹象。展望未来,新兴国家综合国力(不是单指GDP)全面比肩西方国家的那一天,也将是西方政治话语彻底退出霸权位置的那一天。也许,西方话语霸权的终结仍然在远方,但全世界已经行走在正确的路上。

当然,西方话语霸权的终结,不是西方政治话语的终结,也不是西方政治模式的终结。终结一言九鼎的话语霸权,目的在于广开言路,让各民族国家都“有权说话”,都可以选择符合本国国情的政治道路和民主制度。西方政治话语如果能够摆脱“唯我独尊”“唯我独好”的优越感,以谦卑的心态、开放的胸襟、平等的身段、包容的意识,从容面对其他声音,大胆推进自身的新陈代谢、吐故纳新,将会迎来西方政治话语的救赎与重生。

五、终结西方政治话语霸权:中国的作用

西方政治话语走向霸权有其历史必然性,霸权的终结也是历史的大趋势。但霸权从来不会自我终结,终结霸权的力量从来不会从内部产生出来,而只能从外部成长起来。展望21世纪,终结西方政治话语霸权的希望在东方,而东方的希望在中国。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绝不能仅仅理解为硬实力的崛起,而应包含政治话语、制度话语、政党话语在内的软实力的全面复兴。习近平指出:“实现我们的发展目标,不仅要在物质上强大起来,而且要在精神上强大起来。”^①所谓物质上强大,就是硬实力的崛起,重在解决落后挨打的问题;所谓精神上强大,就是软实力的复兴,重在解决失语挨骂的问题。我们所说的话语复兴,不是为了否定西方话语,而是确证自我的话语权利;不是为了荣登话语霸权的王座,而是为了开创没有

①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一卷,第46页,外文出版社,2014年版。

霸权的话语时代。

然而,客观地说,中国政治话语“贫困”也是事实。所谓“贫困”,是指中国尚未形成一套与其综合国力相匹配的、与自我文化身份相适应的、与西方政治话语相比肩的、具有全球感染力乃至传染性的政治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没有形成一种能够准确阐释当代中国伟大政治实践的政治学范式。在国际学术舞台上,中国政治话语无法与西方话语平起平坐,平等对话,以至于离开了西方概念和分析范式的中介,能否自我表达都成了问题。“面对中国日新月异的生动实践和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现有的政治学知识和理论还没能作出全面系统的阐发和解释。……中国政治学还未建构起成熟的学术体系、理论体系、话语体系。”^①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的实践要求相比,政治学知识生产中的有效概念供给尚不充足。构建能够对中国政治现象和政治道路进行有效解释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实现中国政治学知识体系的本土化,成为今天中国政治学研究的紧迫任务。

回顾三百年来学术话语的变迁史,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伟大的实践必将催生伟大的理论,强大的硬实力才能撑起强大的话语权。失败的实践,说什么都没有底气,怎么说都没人信;伟大的实践,沉默也是无声的话语权。林毅夫曾以经济学为例指出,哪里故事最精彩,哪里经济学最具影响力。从1776年亚当·斯密(Adam Smith)出版《国富论》,一直到20世纪三四十年代,在这160年的时间里,世界上最伟大的经济学家无不来自英伦半岛或者侨居英国的外国经济学家。而从19世纪30年代以来,世界上最伟大的经济学家不是美国人,就是在美国工作的外国经济学家。原因很简单,就是在那个时间段里,这两个国家是世界上最伟大的样本,它们的故事最精彩,解释这个伟大样本的理论成果就是最伟大的成果,它们的话语自然也就是世界的中心话语。因此,没有硬实力的崛起,无法成就西方的话语霸权;同样的道理,没有硬实力的超越,也无法打破西方的话语霸权。终结西方话语霸权,最好的方式不是理论批判,不是政策宣示,不是道德审判,不是价值谴责,而是实践批判,是基于成功实践、伟大样本基础上的话语批判。

今天,中国稳居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成功闯出了一条具有显著制度优势的政治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已经构成当今世界最为重要的政治景观,这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史上、在人类社会发 展史上、在世界政治文明演进史上都是绝无仅有、独一无二的。这与西方政治模式、苏联政治模式都是不可同日而语的。中国当下面临的多党合作、党政关系、公平正义、清廉政治、民主监督、民族宗教、人权保护等问题,都有赖于创建中国特色的政治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都寄希望于在政治哲学的高度和政治学原理的层面给出中国的答案,作出中国的原创性贡献。习近平指出,“这是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这是一个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②回看走过的路,中国创造的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从一定意义上说,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奇迹,这必将成为滋养中国政治学的深厚沃土。远眺前行的路,民主政治的中国样本必将引发全球学界的高度关注,政治制度的中国方案将为人类探索更好社会制度提供全新选择,制度建设的中国经验将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重要启迪,中国政治话语终将获得与其世界大国(强国)方位相匹配的国际地位。

今天,尽管国际话语格局“西强我弱”的现状没有彻底改变,但中国政治话语的崛起已是不可逆转的发展态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意味着以社会主义为性质定向的一整套政治制度在21世纪的中国焕发出强大生机活力。从社会制度的构成来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① 周平:《增强概念创新的自觉与自信》,《人民日报》,2020年2月10日。

② 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6年5月19日。

是一个“成套设备”,其中起四梁八柱作用的是根本制度、基本制度、重要制度,这些制度内在贯通、相互支撑,共同搭建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完整架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是人类政治文明史上的伟大创造,开创了人类政治文明的崭新阶段,为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成功实践树立了“中国样本”,为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理论的现实化作出了中国贡献,为后发国家打开现代化之路提供了全新制度选择,为当代中国发展进步提供了根本制度保障,为捍卫社会公平正义奠定了坚实制度基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成功实践,没有结束人类对制度文明的探索,而是在实践中不断开辟通往更高政治文明、更好社会制度的道路。假以时日,中国特色的政治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如果能够对中国的政治道路、政治逻辑给出科学的解释,如果能够将制度建设、政党建设的中国经验上升为普遍的知识体系,如果能够为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建设和制度选择提供中国智慧,那么那时中国的发展优势、制度优势、治理优势终将转化为政治话语优势。

六、结语——走向美美与共的话语时代

启蒙时期以来,西方政治文明和政治话语逐步确立了在全球知识界的统治地位,主导了全球政治议题的话语权。比如:关于民主政治的前途命运,“历史终结论”一度占据了绝对话语权;关于政治文明的未来图景,“西方中心论”迄今仍具有很大的话语空间;关于社会制度的选择,“世界趋同论”“社会主义失败论”曾一度甚嚣尘上。然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极大地动摇了国际政治话语的传统格局,西方政治话语的解释力在衰减,人类有望迎来美美与共、和谐共生的话语时代。

毋庸讳言,西方世界的话语权力主要是由强大国力建构起来的,而不是由强大的真理力量和道义力量支撑起来的。这也就决定了西方世界的话语权力必然随着西方世界整体力量的起伏而波动,而不可能任凭国际风云变幻,我自岿然不动,永远端坐在国际舞台之巅。今天,很多国家面临的政治乱局、民主陷阱很大程度上源于西方话语的影响,源于西方话语的霸权逻辑和中心论思维。不终结西方话语霸权,就不可能推进全球政治文明的重建,就不可能走向全球正义的国际秩序。

21世纪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世纪,也应当是中国话语复兴的世纪。中国政治道路的成功,深刻改变着世界学术格局,西方政治话语的全球解释力大为衰减,世界学术舞台不再只有一个声音。中国政治话语的决定性出场,将为一些国家走出政治乱局、低质民主陷阱提供中国智慧,终结西方话语的全球统治地位;将为改变现行不合理的国际政治秩序、文明格局、安全秩序提供中国主张,终结一方主导、几方共治的全球治理体系;将为人类探索更好社会制度提供中国经验,终结西式自由民主制度统治全球的制度神话。一句话,中国政治话语的全球崛起,将会助力世界终结西方的话语霸权,迎来美美与共、和谐共生的国际话语时代。

作者:陈曙光,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北京市,100091)

(责任编辑:刘杰)